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海外藏珍稀中國戲曲俗曲文獻彙刊第二種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藏

稀見中國鈔本曲本彙刊

黃仕忠 〔日〕大木康 主編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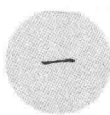


海外藏珍稀中國戲曲俗曲文獻彙刊第二種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藏

稀見中國鈔本曲本彙刊

黃仕忠
〔日〕大木康 主編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藏稀見中國
鈔本曲本彙刊：全 32 冊 / 黃仕忠，（日）大木康主編．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10

（海外藏珍稀中國戲曲俗曲文獻彙刊第二種）

ISBN 978-7-5495-3979-6

I. ①日… II. ①黃…②大… III. ①古典戲劇—劇
本—作品集—中國—古代 IV. ①I230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138131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541001
網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廣西大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南寧市高新區科園大道 62 號 郵政編碼：530007）

開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張：1151.75 字數：18428 千字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25600.00 元（全 32 冊）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海外藏珍稀中國戲曲俗曲文獻彙刊

1. 第一種 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第一輯）（2006年12月）
2. 第二種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藏稀見中國鈔本曲本彙刊（2013年10月）
3. 第三種 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第二輯）（即將出版）

長澤規矩也和雙紅堂文庫

黃仕忠

長澤規矩也（1902—1980），字士倫，號靜庵，神奈川人。1925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科。20世紀20—30年代之間，曾7次赴中國，以尋訪中國古籍與和刻漢籍為主要目標。畢生致力於以中國文學及漢籍為中心的書誌學研究。所撰《現存明代小說書刊行者表初稿》（上、下）（《書誌學》三卷三號、五號，1937）、《明代戲曲刊行者表初稿》（《書誌學》七卷一號，1936），對明代刻工研究，有開創之功；所撰《漢籍解題》，後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文獻學界有著很大的影響；所撰《日本現存戲曲小說類目錄》（《文字同盟》第七號，1927）、《家藏舊鈔曲本目錄》（《書誌學》四卷四號，1935）、《家藏曲本目錄》（《書誌學》八卷三號，1937）、《家藏中國小說書目》（《書誌學》八卷五號，1937）、《家藏中國曲本小說書目錄補遺》（《書誌學》十三卷一號，1939）等^①，首次比較全面地梳理了日本所藏中國戲曲，其成果後來為傅惜華編《中國古代戲曲系列目錄》所吸收。

長澤與其他日本學者對於日藏中國小說戲曲文獻的調查介紹，引起中國學界的廣泛關注。1930年代初孫楷第東渡日本，在東京尋訪中國通俗小說，完成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書目《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胡適在為孫氏此書所作的序中強調：『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日本做了中國舊小說的桃花源，如果不靠日本保存了這許多的舊刻小說，我們決不能真正明瞭中國短篇與長篇小說的發達演變史！我們明白了這一點，方才可以瞭解孫先生此次渡海看小說的使命的重大。』^②而孫氏東渡，得到了長澤

① 以上各篇後收入《長澤規矩也著作集》，東京：汲古書院，1985年版，第五卷。

② 胡適：《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序》（1932年7月24日），《胡適文存》，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四集，第292—293頁。

規矩也直接的介紹與幫助。同樣，1938年歲末，傅芸子在東京訪曲，也有賴長澤之力^①。長澤所撰《民國時代之友》一文（1963）^②，介紹與胡適、鄭振鐸、郭沫若、馬廉的交往，可見他與中國學界關係之密切。鄭振鐸、馬廉等人的戲曲小說研究，均有得益於長澤之處。

此外，現代日本各公私圖書館所藏漢籍之編目、分類整理，長澤規矩也的功績最為突出。他不僅作為主要成員或主持者，參與了靜嘉堂、內閣文庫、成實堂文庫、大東急紀念文庫之漢籍分類目錄的編纂，而且通過自己的工作，為日本的漢籍編目定下了基調。長澤一生共為三十餘所公私收藏機構編製了漢籍目錄，晚年編有《未刊諸文庫古書分類目錄》等。又為圖書館工作人員提供諮詢。並據訪查所見，編成《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並擇其中重要者予以影印。正是由於長澤規矩也的創導和努力，才使日藏漢籍編目取得長足進步，為今日人們尋訪海外存藏書籍提供了方便。

早在中學時代，長澤規矩也就因深感舊式和漢辭書使用不便，產生了編集辭典的念頭。長澤所纂《新撰漢和辭典》（1937），對漢和辭書的部首檢索作了創新式的改革。出版方告知此項成果已可申請專利，但他却更願意學界隨意使用。此後的漢和辭典編纂，多採納長澤所改良的部首索引，亦可概見其胸懷。

1962年，長澤規矩也以《和漢書的印刷及其歷史》一題獲博士學位。1966年，以中國書誌學研究以及辭典部首方面的革新成就而獲頒紫綬褒章。瀧川政次郎博士稱讚長澤規矩也：「青壯年時期為日本的書誌學開拓了新領域，晚年遍歷國內之古文庫，致力於其中所藏的漢籍之保護、表彰，使江戸時代所覆刻的主要漢籍悉數復刊，使江戸時代埋沒於世的漢學家的著作得以出版，使國民重新認識江戸時代的文化，厥功至偉。」^③

長澤規矩也曾寫有《我的蒐書歷史之一斑——以戲曲小說書為中心》一文，回憶自己收集戲曲小說的過程。晚年所撰《收書遍歷》一文，又從不同角度回憶自己訪書的經歷^④。今以此兩文為主要線索，參考《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共二卷）所錄其他

① 傅芸子（1892—1948），傅惜華之兄。1932年赴日，任京都帝國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講師，主講中國語言文學。1938年11月至12月間，在東京訪曲，撰有《東京觀書記》、《內閣文庫讀曲記》、《續記》等文，後收入《白川集》（東京：文求堂初版，1943年版）。又，2001年1月遼寧教育出版社《新世紀萬有文庫》第四輯有簡體字版，與《正倉院考古記》合刊。惜該版刊落原書之圖版，且書前陳子善所撰之「本書說明」，已不知芸子之卒年，可知斯人之落寞。

② 《民國時代之友》（文遊抄），日本經濟新聞，1962年4月23日。（編者注：為方便閱讀，原日文書名在正文中採用中文譯名，腳注中保留原日文）

③ 《長澤規矩也著作集》，東京：汲古書院，1992年版，第一卷序。

④ 《わが蒐書の歴史の一斑》，見《雙紅堂文庫分類目錄》（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1），第71—74頁。又《長澤規矩也著作集》（東京：汲古書院，1984），第六卷，第167—177頁。《收書遍歷》，前揭書第203—287頁。

篇什，略就其時之背景作一補充說明，概述於後。從中也約略可見日本漢學之轉型，以及中國俗曲受到關注的過程。

長澤規矩也从小由祖父龜之助撫育長大。龜之助畢業於長崎師範學校，自學成才，成為出色的數學家，並以翻譯西洋數學書而自成一家。因編譯教材之版稅收入，家遂富饒。龜之助無子，贅寸美遠（本姓後藤）作養子，是為規矩也的父親；母親長澤滋是家中的二女兒。規矩也出生時，父母尚是學生，故主要由祖父扶養長大。作為長孫，規矩也尤得祖父珍愛。

祖父給他起這個名字，是希望他成為一名數學家。入中學以後，長澤就明白自己並沒有數學方面的潛質，而是更喜愛文史。這又與祖父的影響有關。祖父於數學之外，酷愛史書，喜歡朗誦詩文，尤其熱心於收集和、漢歷史與詩文書籍，不過對來自中國的古籍「唐本」，則几乎是從不購買。祖父對規矩也說：「要是數學不成，就做歷史或漢文。」

從小學開始，長澤規矩也就是祖父的「隨從」，經常陪著去神田的書店，挑書、買書，觀聽長輩的交談。由於耳濡目染，長澤規矩也從小就熱衷於此道。當時，一般人是在進入大學之後，才會流連於書店，而長澤則從小學開始，就已經頻頻出入於古書店，開始按自己的興趣購書、藏書了。所以，數學雖未學成，國文成績却非常優秀。大正十年（1921）以文科甲等的成績考入第一高等學校。此時，他的志向是研究日本漢學史。

但是，大正十一年（1922）一月，家中不慎起火，十餘萬卷藏書一時化為灰燼。失去了研究資料，長澤也考慮過是否轉向專攻中國史。箭內互先生等特地熱心地勸說。但「第一高等學校」的先輩倉石武四郎給予更熱心的誘導，把他介紹給漢學家塩谷時敏、安井小太郎^①，從而改變了長澤未來的學術方向。大正十一年間（1922—1923），在塩谷青山的菁莪塾參加《文選》的輪讀；大正十一年至昭和二年（1922—1927），每個星期天都向安井樸堂學習經學。同時，還在東京外國語學校專修科（夜校）中國語部學習漢語。就這樣，長澤為將來專攻中國哲學科，邁出了第一步。

但是，入大學之前，長澤對選擇中國哲學，還是中國文學，陷入了迷茫。東京大學的中國學當時招收哲學、文學兩科學生。長澤對文學本無特別的熱情，亦非擅長。至於哲學，他與倉石武四郎一樣，不喜歡宋學。所以倉石把他拉到塩谷温在同心町の住處，為他作了介紹。當時，塩谷温是東京大學中國哲學中國文學的第二講座教授。因著這樣的機緣，並不喜歡文學的長澤規矩也，祇

① 鹽谷時敏（1855—1923），漢學家，字修卿，号青山。第一高等學校教授。著有《青山文鈔》、《文章截錦》、《漢文類別》等。安井小太郎（1858—1938），漢學家，本名安井朝康，號樸堂。大東文化學院教授。著有《論語講義》、《日本儒學史》等。

是因為討厭宋學，選擇進入了文學科。

塩谷溫當時已經準備帶大學院生，但尚無正式學生，所以就給長澤講授為大學院生準備的《元曲選講義》。為此，長澤從上海訂購了一套影印版《元曲選》。這也是他買的第一部戲曲書。《元曲選》的受講，成為他蒐集戲曲小說書的開端。

長澤從大學到大學院生，一直師事塩谷溫，這也正是塩谷溫一生學術的鼎盛時期。長澤涉足戲曲小說之收集與研究，也是出於塩谷溫的影響。塩谷溫當時正在作《國譯元曲選》，讓學生演繹，在課堂上講授討論，長澤是參與人之一。

上大學以後，必須用到上海出版的漢籍新書，如果向文求堂等書店購買，價格太高。祖父說，他在上海有熟人，可請人代購。經祖父的舊知東亞公司桑野締三氏作介，長澤陸續從上海購書。僅收五分的手續費，遠比文求堂便宜。所以長澤能够第一時間從中國獲得最新出版的書籍。

當時，家裏給長澤的零花錢是每月20日元，而古書特別購入費是100日元。大部頭的書，或在中京、京阪等處買的，還在這100日元之外。這樣的優裕條件，在當時是常人難以想像的。事實上長澤一生從來沒有為生計犯過愁。對於學術，更多的是基於興趣，故而能使其學問始終保持著一種無功利的純粹特性。這更是後人難以企及的。

大正十四年（1925）九月十二日，大學三年級學生長澤規矩也，閒逛東京大學赤門對面的琳琅閣，主人向他推薦用舊報紙包著的宣德十年（1135）刊本《新編金童玉女嬌紅記》2冊，說此書係從日本故家散出，因蟲蝕過甚，沒有書店願意收購，主人原用15日元收下，願以20日元轉讓。長澤此前還從未買過10日元以上的古書，所以先借了回來。一查，乃是世間孤本，便欣喜地去給塩谷溫看。又請教和田萬吉博士，托池上製本所修補重裝。裝幀完畢，已是十月二十八日。付錢時，長澤對書店主人說，這是天下無雙的孤本，價錢再高一點也沒關係。但琳琅閣主人並未多收。結果以書價20日元、修補費10日元得手。這是長澤畢生發掘的第一部戲曲孤本，他的書齋名雙紅堂，一半是因為此書。此書隨後由塩谷溫主持影印，於昭和二年（1927）公之於世。長澤則寫了《讀明宣德刊本〈嬌紅記〉有感》一文，刊於昭和三年（1928）十一月出版的《斯文》雜誌上（第十編第十一號）。

由此，長澤規矩也正式踏入中國古籍收藏者與發掘者的行列。

同年十二月，據名古屋松本書店的目錄，花40日元買了寬延刊本《唐書》82冊，外加郵費。又由祖父陪同專門去名古屋松本書店參加展銷會，收購了三重旭旦齋的幾本舊藏書。從別的書店買了貫華堂原刊本第五才子書《水滸傳》32冊，7日元；隨帶清刊本《玉嬌梨小傳》，1元30錢。此外，在京都買了巾箱本《第一奇書》，8日元，萬治四年（1661）刊本《南華真經注疏解經》，6日元。

大正十五年（1926）二月，長澤規矩也從東大中國文學科畢業，進入大學院讀研究生，研究題目定為『中國文學之書誌學研究』。六月，為三菱財團的靜嘉堂文庫編目，並受託為文庫購書（至1939年7月止）。靜嘉堂文庫自從1907年購得歸安陸心源蒔宋樓舊藏後，一直未有編目。涉足此項編目工作，對長澤後來拓展日本書誌學領域，具有重要意義。

昭和二年（1927）六月，逢前田家尊經閣文庫的一部分藏書出售，得到了沐日堂刊本《爾雅注疏》、清初楊素庵刊本《天工開物》、明崇禎刊本《孝經大全》、明萬曆刊本《升庵先生文集》、板本節山舊藏寫本《胡言漢語》等。這些購買經歷，為此後長澤連續多年赴中國收購古籍，作了鋪墊。

是年，以『關於孔子的祭祀之研究』為題，獲得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補助。八月，為調查相關文獻而赴中國，滯留北京。此時長澤的父親作為技師被派遣到奉天兵工廠，因著父親朋友的關係，長澤得以住在大倉洋行在北京的辦事處。

此行購得《孔宅志》、《闕里述聞》、《南工廟祠祀典》等，以及關於北京掌故的書，還有一些清初刻本戲曲小說。在北新書店和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店的分店買了些新書，這些書在東京的書店是見不到的。他個人當時尚未涉足古書珍本，也沒有想到要買珍本。為靜嘉堂所購的書籍有：號稱為戴東原舊藏的《明抄本授經圖》4卷20冊，55元；殿版《日講易經解義》8卷首一卷20冊，45元；抄本《滿州祭神祭天典禮》6卷6冊，60元；內抄本《續通典考補》1冊、《續通志考補》3卷3冊（此書未曾刊行過），60元，等等。所謂戴東原舊藏本，後來細繹，發現其中之藏章甚怪，且不見於他處，抄錄時間似也晚於其年代。這是長澤為自己當時古籍版本知識相對缺乏而交付的學費。

十月，祖父龜之助突然去世（67歲）。長澤規矩也在北京停留不足兩月，即從陸路急遽歸宅。但內心依然戀著北京。昭和三年（1928）一月末，再赴北京。

從大一時參加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旅行團開始，他一生中共有七次赴中國。而從1927年到1932年，長澤規矩也每年都去北京，時間大都在兩個月以上。

在北京期間，長澤規矩也主要為三菱的靜嘉堂文庫買書，同時也幫大倉洋行鑒定書籍。大倉家在大正六年（1917）買入了董康誦芬室的舊藏，正熱心於中國古籍善本的購買，所以委託長澤代為鑒定殿版和宋版^①；靜嘉堂則在得到陸心源的藏書後，有意引述《四庫全書》，以收書全備為目標，並不以貴重書為主要對象，所以長澤主要從書目、叢書等類中，選購《四庫全書》收錄而文庫

① 大倉家所得，今歸大倉文化財團之大倉集古館。編有《大倉文化財團漢籍善本目錄》（同館編發，1961年）。

未有人藏的書籍。為避嫌，長澤個人祇購買文庫不收的圖書。戲曲小說因為未入傳統四部，所以成為他個人購書的目標。長澤為靜嘉堂文庫購買的圖書，多為大價碼的書，但不像中國的圖書館工作人員那樣收取回扣（當時行規，一般收取十分之一的回扣），所以頗受書店的歡迎。這樣，以三菱、大倉為目標，在長澤身邊，北京的書賈附集如蟻，常常一大早就被敲門聲吵醒。

昭和三年（1928）正月末，長澤從東京出發赴北京，五月末因張作霖事件影響，受勸歸國，其間有整整四個月滯留北京，一步也未出城外，每日以訪書兼聽戲度日。他從天橋請了白姓旗人胡琴師，上午到住處來教琴。又請人教唱，學習時調、大鼓、京調、昆曲的唱法。加入了所謂戲迷的行列。當年長澤向白師傳詢問雜耍館演出內容的交談記錄，被精心保存了下來，成為瞭解當時演出狀況的難得資料。學唱時師傅為他草書寫的曲譜，也完整地保存着，從中可見長澤學唱時的認真細心。長澤所學唱段，有皮黃《黃金臺》、《托兆碰碑》、《捉放曹》、《武家坡》、《三娘教子》、《文昭關》、《硃砂痣》、《四郎探母》、《烏龍院》、《空城計》、吹腔《小放牛》、《探親家》等，他學的主要是小生與老生的唱段^①。

長澤熱衷於戲曲小說，事出有因。他煙酒不沾。大學時，陪塩谷温吃飯，屢被訓叱：「不解酒味，能懂李白的詩嗎？研究中國文學，却不能作詩！」長澤作文寫詩，私下請安井樸堂刪正，又受樸堂的訓叱。樸堂知其無詩才，婉勸道，與其有寫詩的工夫，不如多讀點書；寫詩，到晚年退隱之後也不遲。長澤年少氣盛，頗不服氣。因為塩谷温不懂唱戲，他便轉而學唱戲曲，希望通過學唱戲曲、寫戲曲，來出人頭地。同樣，他在大學二年級時（1924），入東京外語學校速成科蒙古語部（學制一年），也是想用塩谷温也不會的蒙古語來瞭解元曲語詞。從這裏可見長澤好勝的性格。

昭和二年（1927）秋，長澤規矩也在北京認識了馬廉。這對他的戲曲小說收藏具有重大影響。馬廉是北京大學教授，戲曲小說研究的專家，他的書齋名「不登大雅之堂」，以表示自己的趣味與傳統學者有所不同。又因得到明刊孤本《平妖傳》，而顏其居曰平妖堂。其時還因對「三言二拍」的研究，受到日本學界之矚目。馬廉同時擔任孔德學校總務長，實際主持孔德學校圖書館的事務。早在1925年夏，馬廉為孔德學校從北京的蒙古車王府購得『大宗詞曲小說』。同年秋天，又為孔德學校購得清蒙古車王府舊藏之數千冊鈔本皮黃與俗曲曲本，隨即請顧頡剛為這些鈔本曲本編目，載於《孔德月刊》第三、四期（1926年12月，1927年1

① 以上資料今存關西大學之「長澤文庫」。係散葉，草草寫於105mm×275mm的紙上，間有長澤所作鉛筆注解。此時長澤的語言尚未過關，收羅曲本無多，故須有人一一作示範。

月)。以故，「車王府曲本」之名遂喧傳一時。^①

長澤規矩也是在「車王府曲本」名聲初起的時候認識馬廉的。結識馬廉之後，長澤經常往來於北河沿的孔德學校。馬廉給他看個人及學校的藏書。長澤規矩也第一次目睹了車王府舊藏曲本，這引起了他對俗曲收藏的濃厚興趣。在此之前，他在北京所買的曲本，都是普通的刻本或活字排印本^②，通過馬廉和孔德學校，長澤瞭解到清代專門代鈔書籍的書坊，並第一次見到了晚清頗有聲名的「百本張」書坊的鈔本，此後，他便以極大的熱情搜羅戲曲與俗曲，尤以人所不取的鈔本曲本為目標。

次年，倉石武四郎以京都大學助教授的身份留學北京，也認識了馬廉，當是通過長澤介紹。兩人此前就蒙狩野直喜、塩谷溫傳授過戲曲小說之研究，此時又加上馬廉的影響，因而十分熱心於戲曲小說的蒐集與研究。倉石曾用30元買入明起鳳館刊本《西廂記》殘本（按：存上冊，今藏東洋文化研究所倉石文庫，實係後印本，借用原板印刷），令時人為之瞠目結舌。兩人一起收集明刻戲曲小說刊本中的插圖，並借用馬廉、王孝慈和孔德學校所藏，共同編集成書，這就是在1980年才得以出版的《明清間繪入本圖錄》^③。長澤規矩也與倉石武四郎兩人的友誼是終其一生的。倉石武四郎在塩谷溫退休後一度兼任東京大學教授，並在1949年後做東京大學專任教授，即是因長澤之力挺與周旋。轉至東京後，倉石也常常邀請當時兼任東大文學部講師的長澤規矩也為由學生主講的討論課作講評。學生對長澤，既害怕又歡迎。害怕的是長澤目光如炬，其缺漏無可逃遁，動遭訓斥；歡迎的是長澤會帶他們看各種古籍善本，可以學到許多知識（此係田仲一成先生見告）。而倉石與長澤，也被後人視為從東大中國文學科出來的最傑出的學生。倉石的藏書今歸東洋文化研究所。他系統地收羅了清人的經學著作，成為日本國內無以類比之蒐集。今觀兩人精魂所繫之書籍，在同一層書庫中比鄰而處，相互致意，不禁令人思緒悠悠。當然，這已是題外之話了。

長澤規矩也與在北京和東京兩地做古書生意的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相熟。他經常聽田中說，買書時若一味壓價的話，書商就不會讓你第一個看到好書。因此，長澤很少對書賈壓價，通常祇說「留下罷」，然後用紙記下書店名和書價，故意把此割與樣書留置案頭。送書的書賈依次而來，在等待之中，似是不經意中看到書割，第二天就會帶來同一版本的書，但報以更便宜的價格，或

① 參見拙文：《車王府藏曲本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俗文學研討會」論文，2006年12月8日），第229—271頁，後刊載於《文化藝術研究》（浙江杭州），2008年第一期。

② 從雙紅堂文庫現存藏品來看，長澤所購民國排印本唱本數量多達652冊。時至今日，也已足難得之物。見拙編《雙紅堂文庫藏民初北京排印本唱本目錄》，《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51冊（2007年3月）。

③ 參見長澤規矩也編：《明清間繪入本圖錄》，東京：汲古書院，1980年版。

者是帶來同一類書相探問。就這樣，長澤不僅得到了最低價格，而且能够得到好書。由此可見長澤規矩也精明的一面。顯然從小就出入於古書店的歷練，使其與書賈打交道時，完全是遊刃有餘。這與倉石武四郎恰成鮮明的對比。

昭和三年（1928）一至五月在北京。這是長澤規矩也在中國居住時間最長的一次，也是他在中國得書最多的一年。他經手購入的書籍，總數達349部之多。其中為靜嘉堂購買的有：清鈔本《李侍郎經進通鑒博議》10卷4冊，160元等；獲一批內抄本，其中之壓卷者為《欽定西清硯譜》零本3卷（卷二、一八、二〇）3冊，墨濃如漆，描寫纖細，共花了450元；明內抄本《北史》零卷（卷三三、三四）1冊，紅格抄本，60元。得文瀾閣《四庫全書》本《湖山集》10卷6冊，有補寫，係《叢書舉要》編者李之鼎的舊藏，當時在北京沒有學者認可其為《四庫全書》的零本。又從文奎堂見到滿漢文書籍之刊本、寫本近50部，全部買下。其中花費最高的是滿文刊本《金瓶梅》100回，42冊，200元。為諸橋轍次博士購得袁世凱關係書（題作『袁氏秘函』）14冊，1000元；《永樂大典》零本4冊，1300元，等等。

這一年，長澤規矩也對北平已稍稍習慣，滯留時間也較長，開始感受到在小店或路邊小攤買小冊零本的樂趣。戲曲收購，也從普通本進到鈔本。在中華印刷局買了許多活字版薄冊的唱本。還買了一套『選刊曲本』，即光緒六年（1880）版《梨園集成》，共24冊，用了12元。這是以往日本人從未買到過的二黃（早期京劇）曲集。鈔本曲本中，以明沈璟《一種情》傳奇清鈔本等較為珍貴。又從保萃齋覓得內府抄本《鼎峙春秋》零本一冊，得以略嘗『內鈔本』之滋味。有見於此，機敏而狡黠的翰文齋高姓店員又為長澤帶來百數十冊百本張的鈔本唱本。而這類鈔本唱本，長澤以前祇見到馬廉和孔德學校有藏。所得除皮黃之外，還有鼓詞、扒山調、蓮花落、山東蓮花落、四平落子等。

昭和四年（1929）七至九月再赴北京。七月，松筠閣出售大批南府（清代內廷演劇管理機構，道光七年即1827年改名昇平署）曲本及其他鈔本曲本，很多到了長澤的手中。其中有內府鈔本50冊，用『至』角錢1冊買得。又有百本張的唱本目錄（此目錄現存於關西大學），百本張子弟書一種以及高腔曲本等等。此外還有影戲的臺本和折子戲用的昆曲脚本等，量很大。此事在北平的古書屋間廣為流傳。由於當時民國學人中還很少有人收藏這類曲本，書店店員紛紛將店中的鈔本曲本，爭先恐後地送到長澤的住處。而最多的部分，實是在文萃齋、東西牌樓和後門的露攤所買，其中有角本和身段譜，不亞於從松筠閣所獲。許多本子未見諸著錄，在得到傅惜華指導後，才得以分門別類。傅惜華能演昆曲。昆曲在清末以後已經很少上演，愛好者多在家中學習唱演，為此而鈔寫的附工尺的選段很多。所以長澤自己祇留下了昆曲譜《雙官誥》和蔣韻蘭正本三經堂鈔本（附身段），其餘都送給了傅惜華。

高腔曲本令長澤深感興趣。因為這是青木正兒博士曾經跑到保定想聽而沒有聽到的。高腔在清代宮中常與昆曲合演。長澤在北京曾有幸聆聽過30幾次。但高腔曲本傳世甚少，其特點是曲詞的左側刻有小三角形的符號，從上方一條直線延下來，因而可以判明。他曾饒有興致地與傅惜華一起到各個書攤上去尋找高腔曲本。

長澤從文徵閣（即翰文齋高姓店員私開的店鋪）送來的晚清文藝齋鈔本中，選購了《桃花記》12冊，《大明興隆》10冊（此種今藏於關西大學），《回龍傳》16冊，《銀盒走國》24冊。這是賣饅頭的蒸鍋鋪用來出租的本子。書衣上有「壹天一換」本記。他後來在東北大學狩野文庫中見到日本人租書籍的類似的冊子及印記，以為兩相比較很有意思。

此外所得，還有快書的本子。

昭和四年（1929），長澤個人在北京所購買的書籍，除了《愛日精廬藏書志》的木活字初印本等書目外，幾乎都是曲本。

是年十月初，長澤規矩也從北京歸國。十一日，在從一高歸宅的途中，見到村口書房的書目，有高崎藩大河內氏散出之書，其中戲曲小說之多，令人吃驚。立即趕去。但神山潤治等人先到，已經買下了《水滸》和奚疑齋的寫本等。所以，長澤祇能在殘剩書籍中，選購了10種書籍，價錢不足100日元。其中有明崇禎刊孟稱舜《二胥記》傳奇2卷30齣，萬曆刊本陳繼儒評《風流十傳》8卷等3種孤本。這些戲曲小說尚是廉價，因為長澤曾從文求堂購買孟稱舜的明崇禎刊本《新鐫節義鴛鴦塚嬌紅記》2卷，花了160日元；此本與宣德刊本《嬌紅記》，即其書齋「雙紅堂」之名的由來。

《二胥記》和《風流十傳》兩書，次年攜到北京保萃齋以金鑲玉重裝^①。北京圖書館求得長澤規矩也的同意後，借《二胥記》以作影鈔。後來鄭振鐸編《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即是用這個影鈔本影印的。

在當時，長澤規矩也似與北京圖書館這樣的購書對手，保持著一種相互交流又相互防範的微妙關係。中國方面對其從日本發掘出來的孤本佚存書深感興趣，又擔心精通版本的長澤規矩也會讓中國的好書流出域外。

時至1929年，長澤規矩也致力於戲曲與俗曲本收集已經有兩年多。當時，北京各圖書館尚以其不登大雅之堂而不屑於收藏。早在1925年，馬廉為孔德學校收購蒙古車王府舊藏「小說戲曲」，關注的其實仍是其中文人所作的傳奇戲曲與小說（兼及長篇的彈詞、鼓詞），且以刻本為主。此類書籍，因王國維、吳梅、魯迅等人的努力，實已漸入學者視野。而車王府舊藏的鈔本皮黃曲

^① 據奧野信太郎（1899—1968）的記錄，1937年前後在北京請人作書籍修補裝幀，價格不過是東京的幾分之一。見其《隨筆北京》（東京：平凡社，1990），第20頁。故長澤攜至北京請人重裝，也就不難理解。又，承東京大學藤井省三教授贈奧野此書，識此謹表感謝。

本與俗曲唱本之類，則猶未入時人之法眼。所以，1925年夏天，當書賈以為馬廉會對所有的戲曲俗曲都喜歡而送來車王府舊藏鈔本曲本時，馬廉祇是讓他們堆在地上，並沒有顯出熱情。事有湊巧，劉復剛從法國獲得博士學位歸來，借住於孔德學校，經常出入於馬廉的辦公室。因見地上堆放著一堆曲本，信手取來翻看，馬廉說，你看看，有沒有價值？劉復是北大歌謠徵集活動（1918年）的發起人，對民間曲本抱有濃厚興趣，所以極力稱讚是好東西，並說你不買我買。馬廉說，既然是好東西，那就祇能由公家來買。這樣，馬廉才替孔德學校買下。這五千餘冊鈔本曲本，僅僅付了區區50元錢^①，在當時祇不過是紙張的價錢。即便如此，這樣的購藏，時人猶以為非，以為「圖書館不應該有這類的收藏！」^②這一事例，可以概見當時中國學術界之狀況。

在這樣的背景下，長澤規矩也收羅曲本，幾無競爭對手。書肆的店主們當然十分歡迎這位爽快的日本人，紛紛把堆於屋角的這類曲本，送到長澤的寓所。

長澤規矩也先後從北京琉璃廠的文徵閣、來熏閣、保萃齋、文萃齋等書肆得到了許多鈔本曲本。在傳奇戲曲之外，尚有晚清的皮黃、高腔、昆曲、牌子曲、趕板、小岔、馬頭調、大鼓書、快書、子弟書等鈔本曲本甚夥。其中還有很多附有身段的內府鈔本。又在松筠閣購得養和堂、百松壽堂等家之鈔本，內有角本（祇錄某一角色的唱詞）、八角鼓、影戲的唱本。而長澤於各書肆所見之舊鈔曲本，不論其品相，即使是片紙亦不放過，幾可以席捲相形容。也以此之故，此類剩卷殘葉尚得以精心保存於世間，為吾人所見。慨歎之餘，亦令人心存感激。

在當時，一個日本人，竟然這般大規模地收購中國俗曲唱本，顯然大大刺激了中國學界，使情況一時為之大變^③。長澤說：「松筠閣多劇本。特別是昭和四年（1929）還有許多南府的劇本，由於尚未受到北京學界的關注而容易入手。但由於此後受到批

① 劉復在《中國俗曲總目稿·序》（北平：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刊，1932）中記述了這段對話。

② 馬廉述及這批曲本收藏經過時曾說：「這一批曲本，是（民國）十四年（1925）的暑假之前，買蒙古車王府大宗小說戲曲時附帶得來的。通體雖是俗手抄錄，然而幾千百種聚在一起，一時亦不易搜羅，並且有許多種，據說現在已經失傳了。十五年（1926）暑假中，承顧頡剛先生整理，編成分類目錄。最近因各方索閱者衆，爰在本月刊分兩期發表，雖然也不免有人要批評我們，說是：『圖書館不應該有這類的收藏！』但是索閱目錄的人們，也許是和我們表同情的吧？」。見《北京孔德學校圖書館所藏蒙古車王府曲本分類目錄》之識語，《孔德月刊》1927年第一期，第33頁。

③ 孔德學校在1925年秋祇用了50元就買下數千冊車王府舊藏曲本，1927年初目錄全文刊出，1927年底顧頡剛遣人為中山大學轉抄得一部分曲本。1928年，劉復主持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系統收集俗曲唱本。由於學界的關注和長澤規矩也等人的收購，也刺激中國本土學者購藏，敏感的書賈遂以為奇貨可居。劉復說：「北平書估（賈）的感覺，比世界上任何動物都敏銳！自此以後（原指車王府曲本發現及目錄公布問世之後），俗曲的價格，逐日飛漲：當初沒人過問的爛東西，現在都包在藍布包袱裏當寶貝，甚至於金銀玉裝訂起來，小小一簿本要賣兩三元。」長澤規矩也則從另一角度說到：「事實是善本日少，書價騰貴。美國人不問書而購，我邦人不顧內容而買，也是書價暴漲的原因之一。」（《中華民國書林一瞥》，《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六卷，第1頁。

評，所以民國方面也踴躍購買，翌年就不能得手了。^①

不僅如此，昭和五年（1930）七月至九月長澤再次西行時，他已經成為中國方面嚴加防範的對象。

在此之前，書賈也以三菱不買的宋元刊本持來讓長澤過目。其中有宋刊本《韓集舉正》、翰文齋的高姓夥計悄悄送到長澤的住處，要求長澤秘密買下。因為長澤也給大倉洋行作古籍鑒定，就推薦給了大倉洋行（此書今藏東京之大倉集古館）。另外，武田長兵衛在購入宋刊本《備急總效方》時，也曾請長澤作鑒定（此書今藏大阪武田科學振興集團之杏雨書屋）。事後，中國方面有所風聞，民國圖書館界懼國之重寶流失，便把長澤規矩也作為重點關注的人物。

是年，長澤從松筠閣買得養和堂和百松壽堂記鈔本昆曲，和宮中演劇用的角本、演影戲的益勝班的底本，馬頭調、八角鼓等的鈔本等等。購得的益勝班底本，其中有影戲《瓊林宴》一種，與《東漢》八卷形制相同，《東漢》首題有「壬申年敬修堂」，「同治十二年（1873）四月初四日建堂娛批」，故可斷定均為同治間之物。影戲的唱本甚少，馬頭調、八角鼓等則少有刊本。『但一年間，北京的學界得知我買了鈔本唱本，在我抵北京前即趕緊搜巡了一遍，所以得手就不如前一年那麼快了。』^②

長澤從保古齋殷氏處買得萬曆版《玉簪記》一種。初問其值，答曰五十五元。回以四十元，殷氏不售。求五十元，長澤不應。殷氏又云：「若請徐森玉氏一覽，當不止此價。」長澤遂以五十元攜回。後來才知道版本學家趙萬里曾有意此書，書賈為獲高價，賣給了長澤。故時有傳言，謂長澤規矩也奪走趙萬里定下的書。購書而致的摩擦，也由此產生。

是年夏，長澤到南方訪書，北京圖書館專門派趙萬里予以監視。長澤說：「無論我是到杭州，還是去南京，或是宿蘇州，受館長之命的趙萬里君到處都圍著我轉。我很後悔把日程報給北京。這樣，到處的古書店都不讓我見到善本，全無收穫。」^③

但這也激起了長澤的好勝心，所以，他在蘇州發掘了稀見的金陵小字本《本草綱目》和覆宋刻本《千金方》。前者存世不過五部。在杭州，發現了文瀾閣《四庫全書》零本。

《本草綱目》之版本，長澤原來並不瞭解。恰好此前在文求堂，偶然聽到中尾博士向田中震二談到金陵小字本比之大本傳世更少，所知傳本僅三四部云云。事有湊巧，長澤隨後即到江南訪書，在蘇州護龍街的一家店裏，店頭第一列明明白白地擺著這部

① 《收書通史》，《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六卷，第206頁。

② 《わが蒐書の歴史の一斑》，《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六卷，第177頁。按：1928至1933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間文藝組在劉復的主持下，著手進行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對中國俗曲的大規模收集工作。兩年時間內收集了數萬冊曲本，成為中國俗曲的淵藪，這批曲本今藏於傅斯年圖書館。此項工作主要出於劉復的倡議，與長澤規矩也收藏曲本正好同時。所以，相互間爭搶有限的資源並不奇怪。可以說，中國方面對長澤收藏曲本雖有防範之意，而未必真的針對其一人而來。請參前注。

③ 《思い出寸人（五）》，《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六卷，第310頁。

金陵小字本。而且標價僅100元。所以也沒討價，迫不及待地按標價買下了。回日本後告訴田中慶太郎，田中便以時價100日元的四朝本《十七史》向長澤交換。由於東京的學者對醫書無興趣，田中轉手賣給了美國人。

不僅如此，《本草綱目》的旁邊，還擺著日本覆宋刊本《千金方》，標價約是500元。此書後來長澤通過東京的書店以100日元脫手。

長澤說：『如果趙君不來監視，至少後者就不會買了。』¹⁰

關於《四庫全書》零本，也有一段故事。昭和二年（1927）初，北京的來熏閣給靜嘉堂寄去文瀾閣四庫零本《嘉禾百詠》，但沒有文瀾閣的任何印記，難以辨別真偽。長澤規矩也請日本著名漢學家市村瓊次郎博士鑒定，說不是原本。昭和三年（1928），再請教北京的版本專家徐森玉，但徐氏沒見過南三閣本，也不能判定。長澤規矩也受託為靜嘉堂購書，一般稀見之本，儘管他自己買得起，也都給了靜嘉堂。這一部《嘉禾百詠》，因為無法判別真偽，來熏閣又催得很急，不得已，長澤寄去200元，自己攬下了。他在昭和五年（1930）訪問杭州，目的之一，即是調查文瀾閣四庫零本的真偽。經調查發現，文瀾閣之書與北方四閣的大型本不同，開本較小，用紙也較差，與北方本之精美不可同日而語。僅卷首有『古稀天子之寶』，末有『乾隆御覽之寶』印記，均未鈐『文瀾閣印』。此種文瀾閣零本，係太平天國亂時散出，雖因亂離而稍有汙損，書衣已不存，但毫無疑問是文瀾閣的原本。祇是北京的學者和商人，以及近在身邊的杭州書肆，均不知其為原本。日本學者更無從知曉。所以長澤實是無意中揀到了寶貝。而令長澤規矩也更為驚喜的是，調查歸來，甫一入城，就在抱經堂書店看到了十餘冊文瀾閣本，整整齊齊地擺放在顯眼的位置，而且書衣還保持原樣，幾乎未動。一問店主，顯然不知是文瀾閣的原本，一冊要價不足200元。但長澤祇是為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買了《竹嶼山房雜部》一冊（存卷一四至二二，今存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又作為給服部宇之吉博士的禮物，買了《墨客揮犀》一冊（存卷一至五），其餘都留在店裏了。後來，他仍把先前所得的那一冊四庫零本給了靜嘉堂。

在趙萬里的監視之下，仍能得到如此珍籍，令長澤大感到得意。長澤說：『因為我不忍全部買走。同樣的例子在北京也有。』¹¹這是指1928年在北京，他雖然驚喜於所獲內府鈔本的珍貴，隨後却仍將其中大半贈送給了北京的滿族學者傅惜華。

順帶一說，當時年方弱冠的傅惜華（1906—1974），小長澤四歲，喜愛戲曲，能演昆劇。時年二十一，當是與長澤的交往，激

① 《思い出す人（五）》，《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六卷，第319頁。

② 《わが蒐書の歴史の一斑》，《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六卷，第117頁。按：長澤在《收書遍歴》中則略表遺憾地說：『今天看來，要是把看到的全部買下就好了。』見《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六卷，第200頁。

發了他收藏戲曲與俗曲的熱忱，傅氏碧葉館後來成為戲曲與俗曲收藏最為豐富的書齋之一（今歸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傅惜華本人則以戲曲俗曲目錄學專家而知聞於世。所著有《元代雜劇全目》、《明代雜劇全目》、《清代雜劇全目》、《明代傳奇全目》、《子弟書總目》、《北京傳統曲藝綜錄》等（另編有《清代傳奇全目》、「文革」中失去不存），於中國俗文學研究，厥功至偉。其多種戲曲目錄中，所載日本藏本，大多係長澤規矩也提供的信息。但也因為他和其兄傳芸子，均與日本學者關係密切，二戰結束後，處境甚是尷尬。

長澤此次赴江南訪書，在南京幾無所得，但在蘇州，從覺民書社買到帶譜的昆曲曲本二冊。多為宣統間所書寫，是一位名叫「陳湘記」的人鈔錄的。又經張元濟的介紹得觀江蘇吳縣潘氏、甫里許氏兩家的藏書。並受到吳梅的接待，得觀其所藏戲曲；吳梅為戲曲研究之大家，長澤向盼睹其風采，故頗覺愉快。

在上海的中國書店，買到了《續離騷》初刻本。當時長澤並不知其價值，實是因店員的勸說而買下，不意先鄭振鐸一步而得手。鄭振鐸隨後特地來信求其照片，以便收入所編《清人雜劇》，長澤則慨然借給了原本。

在北京，翰文齋的高姓夥計給長澤帶來了三朝八行本《禮記正義》和南宋刊本《重校添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零本各二冊，說也許是內閣大庫本。長澤為東方文化學院各納了一本，自己手邊也各留了一本。又買了清刊本滿文《三國志》24冊（120元）及其他。

從北京的私人手中，購得四庫零本《三魚堂四書大全》（卷一及卷首）一冊。據說這原是殘本，全部10冊需3000元。書衣有「文淵閣寶」之印，顯為文淵閣本，而非偽造。但《三魚堂四書大全》並未收入四庫，而僅見於存目內，未免令人生疑。長澤的判斷是：此書初擬收入，後被剔出。他為靜嘉堂文庫買下此書，是覺得可作為樣本，以便將南方三閣的小型本與北方四閣的大型本作比較。此冊最薄，故報以全書十分之一的價格而成交。不意，第二年（1931），北平圖書館袁同禮副館長專程邀請一晤，長澤規矩也赫然見其餘6冊出現在袁氏桌上。袁館長先以與長澤先前同樣的疑問，詢之長澤。長澤即席侃侃作答。袁氏又再三對此書第一冊之缺失，表示詫異，長澤則訥訥然未敢回應，大是困窘。筆者推想，以長澤規矩也的性格，如果袁館長誠意相告，長澤自當欣然居中斡旋，使之成為合璧。但這般設下「鴻門宴」，不免令當事人大出意外，一時難以回答。結果祇留下一個難堪的場面，令人歎息。

昭和六年（1931）七至九月，第六次赴中國，所得似甚少。僅是夏日，在杭州抱經堂用70元買得延享版《一切經音義》55冊，稍可一說。是年刊出了他所寫的《中華民國書林一瞥》，細緻介紹了北京及江南各地書肆的情況，成為後人瞭解1920年代末中